

读《1949年以前韩国文学汉译和意识形态因素》

贾洪伟

(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所, 北京, 100089)

摘要: 从史学写作范式和史学知识的角度, 对《1949年以前韩国文学汉译和意识形态因素》一文, 从“文不对题”、“个人意识形态过于浓重”、“断代史梳理凌乱”和“意识形态的三点立论不够充分”四个方面, 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 以促进学术交流。

关键词: 韩国文学汉译; 意识形态; 翻译断代史

中图分类号: H059

在考察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语言学典籍译介状况之余, 偶然发现有关韩国文学汉译史的专门文章, 由哈尔滨工业大学韩国语系金鹤哲老师撰写, 发表在《中国比较文学》2009 年第四期, 篇名为《1949 年以前韩国文学汉译和意识形态因素》。看到这篇文章, 心里真是由衷地兴奋, 因为自己也是做历史研究的, 深知这方面的每一篇文章, 对其所在领域, 都可能会有深远的影响和贡献, 就不顾一切地捧读起来。

文章共十页, 由介绍性文字(2 段)、20 世纪上半期韩国现代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情况、作品选择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翻译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和结语等五部分构成。从学科史学角度来看, 这篇文章很有价值, 首先, 这个期间段的历史文献的深入挖掘, 是功不可没的。其次, 不论对翻译还是比较文学, 亦或是文化研究,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翻译上, 这个阶段的文学作品的历史研究, 能够有效地理清中国翻译实践、技术、译作接受、译作影响、版式和出版状况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 在比较文学方面, 这个历史阶段的深入研究, 扩展了比较文学史的覆盖范围, 揭示了早期中国译介外国非主流文学作品所使用的方法、作品类型、译作风格与当时意识形态的关联、出版状况和接受度等, 有助于还原早期中国译介外国文学的真实面貌; 在文化研究方面, 这些非主流文化作品的翻译, 有助于国人了解其他种族的生活状况、政治态势、地理风貌、历史风情等, 还能揭示特定遭遇情况下百姓的真实生活面貌, 以加速译入语社会的目标性变革。再次, 断代史研究能够廓清特定历史阶段本学科的发展面貌、特征、历史影

响以及其在整个科学领域内的位置（可能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别，但没有重要与不重要的区别。如果这样主张，就是个人意识形态过于浓厚或个人偏见太强，不为史学研究所取），连同这个历史阶段的成绩，对于今天本学科的发展所能提供的借鉴意义。

上述三点中，第一点要求研究者须对历史材料观察客观、描写客观、分析客观、解释客观，有必要采取历史移情、考辨分析、对比研读的方法，秉承实事求是、科学认真的态度，去开展这个研究，要求做到不歪曲、不乱造、不夸张史实的三“不”原则；第二、三点要求研究者在有所侧重的情况下，本着客观的态度，对史实考辨发挥、比较分析、系统整合，梳理出这个历史时期的学科风貌，给学科发展提供可借鉴的资料；在从事史学写作时，要秉承史学写作元语言的操作规范，即客观描写分析和解释，少用四字成语、秉承学术态度，对特定历史时期的事件，或人物，或地点要用历史称谓后加括号解释。

可能对非科班出身的人士或学者，这样要求未免有些苛刻，可学术就是要按照学术的规范来进行，只有这样学术才能进步，才能有所继承和超越，做出来的成果也才有价值。在阅读金氏这篇大作后，我对当下的文章作者真是捏了一把汗，但还好编辑宽容，这篇文章才能顺利发表。严格来说，这篇文章不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文不对题；二，个人意识形态过于浓重；三，断代史梳理凌乱，分析工作力度不够；四，意识形态的三点立论不够充分。

1. 文不对题

韩国今天指南朝鲜，或说朝鲜半岛南部，1948年单立邦国。如果说1949年以前的韩国文学汉译史，那么，这段断代史则只有一年，或不超过两年。即便作者在介绍文字中解释说：“本文为论述方便起见，在论述时一律使用韩国”（金鹤哲 2009：62），但是在史学研究中，韩国无论如何也不能代替两者，这是史实问题，是不能人为改变的，也是政治问题。不信的话，你拿台湾和大陆两者比照一下试试！不论怎么说，在1948年之前两者是一体的，只是1948年后才一分为二，因此，两者不能互相替换，只能用朝鲜或大韩民国称呼。

对于 1948 年到 1949 年那一段，如果作者非得那么分的话，就单独称呼，从而标题改为：《1949 年以前朝鲜半岛文学汉译》即可。

否则，标题是韩国文学，内容却兼顾两者，那这篇文章真是莫名其妙了。如果研究韩国文学，内容则只能涉及韩国一个政体范围，决不能涵盖其他，就像我不久前写的《苏联语言学汉译历史分期》一样，苏联语言学（专指普通语言学）在中国的译介源自 1930 年代，到 1991 年结束，之后的内容不管多么丰富，都不能囊括在内，因为 1991 年后，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了。

2. 个人意识形态过于浓重

史学研究中，亦或是科学研究中，也可以说学术写作中，很忌讳个人偏见或个人意识形态出现在文章中。本文中，作者把我们习惯称为的“朝鲜半岛”改为“韩半岛”，用只有一年历史的“韩国”称呼“朝鲜”和新兴的“韩国”，用“韩国”替代文学作家的出生地或原籍“朝鲜”（我出生在黑龙江省五常县，籍贯是河北永平府，不管什么时候，都不可改变。即使今天五常已不是原来的县制，或因为我后来曾生活在哈尔滨，也不能有所改变），把作家自愿到北朝鲜去生活叫做“越北”，等等，都具有极度的个人偏见和意识形态。否则，为何不用朝鲜代替两者呢？为什么要说“越北”，而不是其他的说法呢？这样的情况在文章 64 页、61 页和 63 页，是很普遍的。

此外，韩国几年前把首都汉城改成首尔，历史不过几年而已，作者却用于朝鲜作者金永八的出生地“韩国首尔”，（2009：63）不是很荒谬么？莫非那时候，真的用过“首尔”这个名字？

3. 断代史梳理凌乱

根据作者的考证，20 世纪上半叶朝鲜文学汉译史，源自 1925 年鲁迅通过日本语转译的《崔致远》、《斗法》和《掉文》等三篇单篇小说，发表在《语丝》第 28 期。直至 1949 年，共有多少篇（部）文学作品被译介，文章并未交代。本文中，作者似乎在仿效文学史，不断地罗列文学作品名称、作者、译者、译介途径和方法，就跟一堆破烂一样，使

得这些史料的真正价值无以体现。

断代史的特点具有时间短、主题分明、分析深入、举证具体详实等特点。一般都要对其进行必要的梳理和分期，这样文章的思路会更清晰，主题也会更明确，论点也会更分明。1948年到1949年这段时间就可单独划分为一个时期，不管在哪方面都有鲜明的特点。

其实，这个问题不妨这样解决：先梳理，后分期，然后在各分期内，按作品、译介方式、成因和特点的顺序来论述。本文是文学作品，那就可以分为小说、歌谣和诗歌（新体和旧体）等；译介方式包括转译、编译、摘译和原文直接翻译等；成因似乎有迎合政治需要、丰富文化（鲁迅1925年的译者序位明证）、加强民族了解等；特点可分为出版方式（报刊杂志、期刊、单行本）、行文方式、版式、语言风格和类型（口语、白话、还是半古半白或不古不白）以及翻译痕迹等。

4. 意识形态的三点立论不够充分

从整篇文章来看，最好看的、最有价值的就是第一部分，第二、三部分就没有那么精彩了，只是笨拙地把成因中的“迎合政治需要”，细分为“弱小民族意识形态”、“抗日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学思潮”，再依此推演。

关于“弱小民族意识形态”问题，试问是中国弱小还是朝鲜弱小？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认为自己弱小麼？怎么知道的？谁承认的？雪莱的诗歌中，不是把暂时荏弱的民族比喻成贪睡的雄狮麼？如果说那时候中国荏弱，今天就有很大的变化麼？如果是朝鲜弱小，为什么我们要翻译他们的作品呢？答案是不是迎合政治需要和文化研究需要呢？鲁迅的话已经作了答复，而且是有理有据，即：“无论朝鲜是否箕子之后，也不管他以前是藩属不藩属，就他的地位历史来讲，介在中日之间传递两国的文化，是研究亚东文明的人所不应该忽视的。我们知道日本学于本国文化研究上可供给不少帮助，同时也应知道朝鲜所能给予的未必会少于日本。”（参见2009：62-63）。历史上来看，朝鲜文化并不比日本的价值低。佛教正式传入日本就是通过朝鲜，可见朝鲜为今日的日本文化做出何等重要的贡献。在农业

上面，朝鲜对日本不也影响甚大麽？

作者做的是文学汉译史研究，而且经自己考证，这段历史起源于1925年，然后却拿1904年作新社出版的《朝鲜史略》（庆幸，书名没有给改成韩国）来证明文学汉译与弱小民族意识形态间的理据性，道：“东方弱国，朝鲜为最，然其政治风俗腐败，与中国仿佛相似，帮丞译之以介绍于我国，……”（2009：67）。试问这本书是文学书么？二十多年的历史变迁，人的想法会一成不变麽？清朝政府有承认过，己不如人么？此外，朝鲜与清朝于1896年结束册封关系，到1904年还不到10年，难说清人那时说话不无偏见。

如果说抗日因素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汉译朝鲜文学的一个因由，也不为过。但是，这是不是绝对了点？比例有多少呢？是从1925年开始到1949年一直如此么？是不是有个阶段性呢？这个是不是归入“迎合政治需要”没有问题呢？如果纯粹出于政治需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呐喊》不是更加革命麽？是不是因为这些作品都是当时的国际气候下的优秀作品呢？当时中国受到新文学、新文字风气的影响，大家纷纷鼓足力气译介全世界的优秀文学，这才可能是真正的源头吧？

无产阶级思潮就一定要译介“韩国”作品么？韩国当时不是殖民地麽？奉行的不是资本主义麽？今天不依然如此麽？殖民地时期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比中国左翼联盟先进麽？还是左翼联盟的思想跟当时朝鲜文学作家的思想有相近之处呢？似乎都说不通吧？

左翼作家翻译朝鲜作品，是出于迎合政治的需要，迎合当时他们自己所提出的改革文学、改革文字、革命政府的号召，理想是伟大的，行为时高尚的，跟哪个联盟的没有直接关系。除非拿小说前后的译者昔日话语为佐证，得出的结果才能有足够的说服力，这是史学研究中最重要，但可惜的是，文章中就是缺少这方面的材料，特别是在论述转译特征的时候，作者说译文时而改写，时而删节，时而又怎么样，然后不痛不痒地给出了一个小片段，就草草收场了。

5. 结语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其所在学科的史学层面，就不免要我们

注意加强史学写作规范意识和训练，以提高史学文章写作的能力。

参考文献

金鹤哲. 1949 年以前韩国文学汉译和意识形态因素[J]. 中国比较文学, 2009 (4) : 61-71.

My Views on Chinese Translation of Korean Literature Before 1949 and Ideological Factors

Jia Hongw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Abstract

The paper criticises, in perspective of historiographical writing paradigm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history and translation history, the thesis *My Views on Chinese Translation of Korean Literature Before 1949 and Ideological Factors* in four parts, i.e. mismatching of the title with its content, prejudice, inadequacy of telling the period of 1925-1949, and ideological factors as the title thesis.

Keyword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Korean literature; ideology; dynastic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作者简介

贾洪伟，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所，研究方向：中国语言学典籍译介史、中西语言思想史、对比语言学史